

香港人心目中的村上春樹

藤井省三

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語中國文學科

一、引言

2007年7月我在日本出版一本名為《村上春樹與中國》（朝日新聞社、朝日選書第826號）的比較文學研究書。這本書第一章「村上春樹裏面的中國」主要討論魯迅對村上的影響以及村上作品裏面有關中日戰爭的歷史記憶。

第二、三、四各章研究在台灣、香港、中國兩岸三地接受村上春樹二十年來的歷史。我在這三章，用四大法則來分析台灣、香港、中國之村上接受過程的類似性以及區別性。「村上春樹現象」是由「台灣→香港→上海→北京」這樣的順時針方向展開的，就時間上來說都是在各地的高度經濟成長有趨緩的趨勢之際。我將這兩種現象分別稱為「順時針法則」以及「經濟成長趨緩法則」。此外，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華語圈國家的民主化運動熱烈地進行著，在台灣是以不流血的改革實現了民主化，但中國卻發生悲慘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扼殺了人民對於民主化的期望，兩岸的民主進程涇渭分明。而民主化運動的結果，強烈影響了各地的村上春樹的接受，並造成程度上強弱之差，這應該可以稱為「後民主化運動的法則」吧。

台灣、香港及韓國，都是在1989年出版了號稱「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的《挪威的森林》（1987年出版，以下略稱《森》）譯本並且大賣之後，便掀起了村上春樹的熱潮。雖然中國也在同年出版《森》的譯本，但是中國的村上春樹現象卻大約十年後才發生。此外，所謂村上春樹「青春三部曲」中的長篇小說《尋羊冒險記》（1982年初版，以下略稱《羊》），譯本推出的時間則比較晚。台灣版為賴明珠翻譯，出版時間是1995年；中國的譯者為林少華，於1997年出版；韓國譯本也是1997年推出。《羊》的譯本出版時間稍嫌落後。其中賴明珠的譯本並沒有附上解說，林少華的譯本雖然付上「總序」，但這是為了因應中國版村上文集的出版。在東亞，《森》擁有超高人氣，《羊》受歡迎的程度遠不能及，這可以說是「森高羊低的法則」。相對於華語圈「森高羊低」，歐美譯本的情形並非如此，《羊》比《森》是略勝一籌，反而是形成了「羊高森低的法則」。

村上春樹的很多作品在中國、香港、台灣有兩種以上的中文翻譯。比如說，

《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或者《青春的舞步》等，1988年初版，以下略稱《舞》）都有兩種中國版、一種香港版，以及兩種台灣版，一共六種翻譯。第五章是對兩岸三地村上作品翻譯特色進行比較研究。

第六章在東亞「阿Q」形象的系譜是以魯迅與村上春樹、王家衛為中心而構思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史的研究。

這本著作將由村上春樹研究的專家張明敏女士（台灣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生）翻譯，明年在台北出版中譯版。

拙稿是為嶺南大學舉行的「香港文學的定位、論題及發展」研討會依拙著第三章修改而成的。

二、台灣的村上春樹現象

在台灣，1989年故鄉出版社發行《森》的中文譯本而引發了「村上春樹現象」。而在這之前四年，譯者賴明珠即率先嘗試翻譯村上春樹的作品，出版了台灣版的村上春樹三部曲：《一九七三年的彈珠玩具》、《遇見100%的女孩》（日文原書名為《看袋鼠的好日子》）、《聽風的歌》（以下分別略稱《彈珠玩具》、《100%》、《風》）。台灣的村上春樹現象具有這麼一段前史。而香港在進入八〇年代後，相繼發生經濟成長趨緩、後民主運動的現象，此時由於台灣故鄉出版社《森》的傳來，突然爆發了村上春樹現象。在1989年12月，一篇介紹村上春樹的文章中，有關《森》的描述如下：

（我本人以及）現年三四十歲的人士，大多數會愛看這部小說，因為它雖非集中描寫六十年代校園的景象、學生的思想，但透過小說中的主角渡邊，以及他的兩名女友直子、阿綠的思緒片段，都令人不期然勾起六十年代的一股情懷。……直子令我想起《紅樓夢》的林黛玉。阿綠則令我想起同書的薛寶釵及晴雯。……《挪威的森林》之所以大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原因，乃因為它是一部百分之百的戀愛小說。……重申了以情為主、以慾為次的近乎柏拉圖式的愛情的高貴。……這本小說另一個成功因素，我認為可歸功於作者在書中頗為露骨的性愛對白和具體描寫。……不過我認為這本小說所形成的旋風，不外是一陣熱潮，熱潮過後，

人們就會逐漸淡忘它。¹

刊登這篇散文的《號外》雜誌，於1997年5月號也推出「尋春大冒險」專刊（模仿葉蕙所譯《尋羊的冒險》一書書名而來）。本文作者葉積奇在此後也繼續針對「村上現象」而發表自己的見解，而他在前述引文中提及《森》只是一時熱潮的預言並沒有言中。

此外，1989年5月，香港暢銷作家李碧華在報紙連載專欄中大力推薦《森》：

終於用了三個晚上，把整整上中下三冊的《挪威的森林》看完。我看的是中譯本，譯筆台灣味頗重。不過一口氣看下去，平凡的青春戀愛小說，說來娓娓動聽，坦率而細緻。……其實它只是一個大學男生與兩個女子之間的愛慾歷程。……本書寫得很「白」，遣詞及對白都很大膽，談愛論性，鉅細不遺，但不覺猥褻。二十歲以下，當引之為知己；二十歲以上，看來會心微笑。作者村上春樹能在書市中打出天下來，有他獨特的魅力。²

李碧華是從小在雜長大，一直以香港、中國的古今歷史取材，著有《川島芳子——滿州國妖豔》（1990）等暢銷書，主題多為描寫主角認同感動搖過程。其作品《胭脂扣》（1985）、《霸王別姬》（1985）等多部作品都已改編為電影。

本文中介紹的香港的村上春樹讀者接受資料，幾乎都是由我指導過的東京大學旁聽生關詩珮（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助教，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助理教授）在香港的大學圖書館和資料庫（Wiseneeds）中蒐集而得的。關詩珮專攻東亞比較文學，也是我目前主辦的「東亞與村上春樹」共同研究的成員之一。她曾在共同研究通訊中發表〈村上春樹與我——一九八九年（我）的香港文學界〉，其中指出她初高中就讀天主教的教會學校，當年的同學大多喜歡英美文學，而看不起中國文學，閱讀日本作家作品的人更不足為數。不過身為文學少女的關詩珮，在當時很喜歡閱讀李碧華等作家的香港現代小說。並受到李碧華專欄的影響而開始閱讀村上春樹。

她這篇在專欄內介紹村上春樹的文字，與她平時的辛辣深刻的文字非常

1 葉積奇：〈《挪威的森林》旋風〉，《號外》第160期（1989年12月號），頁數不明。

2 李碧華：〈挪威的森林〉，《天安門舊魄新魂》（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0年1月第三版），頁168。

的不同，寫來非常平實，口氣也非常的冷靜，好像在轉述一項通告似。……我也一口氣看完了，至於看了多少晚，實在已記不清了。不過，實不相瞞，記得很清楚的卻是，當時的感覺，實在失望頂透了！³

例如雖說《森》中有「鉅細不遺」的性愛描寫，但和《紅樓夢》第六回中賈寶玉和侍女的初次性經驗，或和李碧華《潘金蓮之前世今生》（1989）中有關革命與強暴的交錯描寫相形之下，關詩珮幾乎不覺《森》有何震撼。而且當時香港小說中呈現的「都會感覺」，是指拜金主義或身份歧視，然而在《森》中登場的爵士樂、美酒都和關詩珮的生活無關。在此順道一提，《潘金蓮之前世今生》是描寫一位擁有《金瓶梅》女主角潘金蓮的前世記憶的孤女芭蕾舞，於文革期間被共產黨幹部強暴時，因為抵抗不從而被視為「淫婦」、「階級敵人」遭受歧視，到了改革開放期，她和港人結婚前往香港，卻因為前世注定外遇的命運，婚姻於是破滅。關詩珮後來會成為村上春樹的忠實讀者，是因為在大學求學時接觸到香港學術界對村上春樹的高度評價，同時亦因她本身也逐漸成長之故。

如前所述，台灣故鄉出版社的《森》傳入香港之初，被評為寫得不錯的戀愛小說。不過不久後在北京爆發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則讓香港人對《森》產生完全不同的詮釋。

三、香港認同感及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

一九八〇年代，本來香港和台灣一樣，都快速地確立了本土的認同感。鴉片戰爭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英國在香港實行殖民地統治，1983年末，英國接受中國方面的要求，同意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歸還中國。不過港人雖稱中國為「祖國」，但一般認為中國和英國同樣是「推行帝國主義政策」⁴的殖民地主義統治者。相對於此，香港這個東西文化交會之地，具有富裕都市的自由及世界主義的文化，這被視為香港的認同感。而在這段期間，李碧華的《胭脂扣》以三〇年代香港為舞台，描寫商賈之家少東與名妓戀愛乃至殉情的故事，並描寫在大陸受到

3 關詩珮：〈村上春樹與我——一九八九年（我）的香港文學界〉，《共同研究 東アジアと村上春樹／通信》第三號，東京大學文學部中文研究室發行，（2006年），頁3-4。

4 周蕾著，岩崎治美譯：〈殖民者と植民者とのあいだで〉，《ユリイカ》（一九九七年五月號「特集香港映画」），頁274。原文載於《今天》第28期（1995）。

迫害而逃至香港的人們的命運，對於形塑香港認同感產生很大的影響。⁵

1989年4月，北京開始發起民主運動，港人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成為香港新統治者的中國產生自我變革，因此把這次民主運動視為自己的事，展開全面支援。不過就在6月4日，北京的民主運動遭到解放軍戰車隊的鎮壓，上海及中國各地的民主運動也被鎮壓，於是爆發了「六四天安門」事件。

香港評論家岑朗天認為，「『後八九』標誌著的，是一種記憶的執著和對『失憶』和無奈的調侃／自嘲／他諷」，⁶是港人普遍的心態。自1980年起十二年間，香港有三十八萬四千人移民至北美、澳洲等地，但「六四事件」發生後，僅僅1990年一年間就有六萬兩千人移民，⁷可見港人挫折感之深。根據岑朗天的說法，當時為香港人提供療傷的管道的，是村上春樹的文學。

一種普遍的、價值的失落，是當時大部分香港人容易感到的氛圍。既有價值觀被一件突發的事件衝擊，幾近崩潰。不但是對中國國情，未來、政治經濟的看法或感情，還是相隨而至的道德、人性問題，都在短時間內一下子擺上檯。……人們在比戲劇更戲劇的現實變化中，在短短三個多月之中經歷了一次大剝離。……在八九、九零兩年間，不少人都感到活得不怎樣真實。大抵正是這種大剝離令村上春樹和香港的「後八九」文化扣上了微妙的關係。村上春樹擅長寫主角突然失落的故事。《挪威的森林》便是寫好友突然自殺死了，主角生命中很多重要的元素彷彿伴隨著消逝遠去。……一種快將喪失感覺的感覺……那是一種特殊的虛無，一種濃烈的無力感。身不由主，眼看著自己心靈某一部分一塊一塊地剝落，消失。隨著這些消逝，便是自己要變成不是自己了，變成另一個人，變成石頭，變成非人。面對此，除了等，我們還可以做些甚麼？⁸

在台灣民主運動過程中，有些年輕人對政治感到幻滅，轉而對《森》產生共鳴。不過，基本上台灣的政治運動還是達成了台灣民主化的重大改革。相對於此，

5 藤井省三，劉桂芳譯：〈小說如何讓人「記憶」香港〉，藤井省三，劉桂芳譯：〈李碧華小說中的個人意識問題〉，見陳國球編：《文學香港與李碧華》（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81-118。另見藤井省三：〈香港——一五〇年の記憶と虚構〉，《現代中国文化探検——四つの都市の物語》（東京：岩波新書，1999年）。

6 岑朗天：〈第二章〉，《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03年），頁42。

7 藤井省三：〈香港——一五〇年の記憶と虚構〉。

8 岑朗天：《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頁47。

「天安門事件」使中國民主化受挫，對於八年後將要歸還中國的香港年輕人而言，他們所受的衝擊應該遠比台灣年輕人來得大。香港年輕人對村上春樹的「喪失物語」產生深刻的共鳴。

於是香港在「順時針」、「經濟成長趨緩」與「後民主化運動」三法則同時運作之下，村上熱潮急遽增溫。因應此現象，博益出版社決定發行香港本地《森》的中文譯本，並請馬來西亞籍華人葉蕙擔任翻譯。葉蕙在「東亞與村上春樹」共同研究通訊中，提及了自己翻譯村上春樹的原委。

1982年，葉蕙考入日本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就讀，主修日本語學。當時馬來西亞政府推行「向東學習」（Look East）政策，大量引進日本的科學技術文化，馬來西亞民眾也開始對日本流行文化產生興趣，因此葉蕙為華人報刊撰寫有關日本音樂、電影、漫畫、時尚等等報導。如今回想起來，她認為那就像是村上春樹所謂「文化的剷雪」工作。後來，因為她的先生調職而有機會居住在香港兩年，葉蕙於是成為博益出版社的合約譯者，正式從事日文中譯的工作。

1991年初，香港博益出版社的出版人急急來電，要我「速速」把《挪威的森林》完成。因為據說「村上旋風」已從日本吹到台灣，所以出版社野心勃勃，要在香港製造新的「春樹狂瀾」。……同年5月，博益版《挪威的森林》面世，據說如預料中一樣掀起了閱讀風潮，很快就再版。出版社很開心，我也很欣慰，那些熬夜伏案的辛勞（譯書當時需兼顧長女且身懷次女）總算有了回報。⁹

後來葉蕙接著翻譯了《舞舞舞吧》，並在香港以村上文學翻譯者而聞名。但由於後來台灣的時報出版社取得了村上作品的中文繁體字版權，儘管博益出版社仍擁有香港的出版權利，卻改採台灣譯者賴明珠的翻譯，因此葉蕙在香港翻譯村上的歷史也就告一段落。葉蕙表示：「自從遇見村上春樹後，我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人生，並做了調整改變。」後來，她還是持續為吉隆坡的華文報紙、雜誌翻譯及介紹日本文學。

當初因為「天安門事件」的衝擊而對村上春樹產生共鳴的港人，終於也和台灣一樣擴大了閱讀方式的範圍，也開始把村上春樹的作品當成享受都市文化的指導手冊。曾在《號外》雜誌預言村上熱潮不會持久的評論家葉積奇，三年後（1992

9 葉蕙：〈村上春樹——一個永不褪色的記號〉，《共同研究 東アジアと村上春樹／通信》第三號，頁4-5。

年)在同一雜誌《號外》5月號上撰文寫道：「香港方面，據知有不少青少年也迷上村上春樹，甚至從他的作品中吸收、模仿日常生活上的行為和態度。……村上春樹已超乎文學範疇，變成了社會現象。」¹⁰

事實上，「閱讀村上春樹作品」成為一種時尚，也可以從當紅作曲家黃丹儀的訪談中看得出來：

黃丹儀負責的歌曲監製工作經常要通宵達旦。……小時候討厭咖啡的苦味，但在日本讀書期間，天氣太冷，手腳容易凍傷，便嘗試飲咖啡暖身。……她喜歡獨自到環境舒適的如半島酒店、何文田 Sweet 19「歎」咖啡。「我通常揀 regular 或藍山，因為奶味較少，咖啡味濃，一邊喝一邊睇村上春樹小說，慢慢享受。」¹¹

半島酒店是香港最高級的飯店之一。Sweet 19 則是位九龍油麻地何文田街的時髦咖啡館，有名的起士蛋糕加咖啡，一客要價港幣六十元。而我愛喝的港式奶茶（加了許多奶泡的濃郁紅茶），在一般茶餐廳只要十到十五港幣。

在香港，前往日本的旅行團以及日式食品都刮起一陣旋風。大受歡迎的北海道團的行程宣傳文案寫道：「可能受到村上春樹的感染，總覺得北海道札幌浪漫悽美，連帶札幌的太子酒店 Sapporo Prince Hotel，亦分外吸引」。¹² 義大利麵和天婦羅料理方法的說明，也引用了《森》和《發條鳥年代記》（以下略稱《發條鳥》）的文字。¹³

四、「森高羊低」還是「羊高森低」

在東亞，村上春樹現象呈現了「森高羊低的法則」，而在歐美、俄羅斯則是「羊高森低的法則」。在香港，我們觀察到了「森羊雙高」的現象。這種雙高的

10 葉積奇：〈村上春樹跟你做個 friend〉，《號外》第 188 期（1992 年 5 月），頁 123。

11 〈咖啡改邪歸正〉，《壹週刊》（2000 年 8 月 18 日）。

12 〈札幌浪漫名勝地〉，《天天日報》（1998 年 10 月 19 日）。

13 〈窮風流之生活有細藝〉，《星島日報》（2000 年 8 月 11 日）；〈《挪威的森林》的美味情懷最正宗的煎蛋卷 & 天婦羅〉，《蘋果日報》（2003 年 2 月 27 日）。

現象，非常適合香港這個被稱為東西交會之地的城市。

關於香港博益出版社繼《森》而推出《羊》的原委，譯者葉蕙的回憶如下：

可能在版權交涉方面有些阻礙，出版社並沒有馬上趁勝追擊，而是相隔一年才把《尋羊的冒險》交到我手裏。我不曉得為何省略了被稱作「三部曲」的前面兩部（即《聽風的歌》和《1973年的彈珠玩具》）。¹⁴

或許是應該從當時版權接洽進展緩慢，讓《羊》比《風》、《彈珠》優先出版這件事，來猜測編輯部對於同作的熱情吧。

其實《羊》在香港出版華語譯本之前，就已經引發了話題。例如1991年3月21日發行的《電影雙周刊》刊載了一篇文章，節錄如下：

我是在大年初一那天窩在床上讀完《冒險羊》的。不為甚麼，只因為在臘月尾一日之內，兩名朋友分別煞有介事的跟我說，大丸地庫有村上先生作品的英文譯本出現，我就巴巴的去了。……讀完《冒險羊》，我的腦筋一時轉不過來，只是感到大大的震動。老鼠竟然死了。到那時候，我才知道我有多掛念老鼠。¹⁵

大丸是1960年到1998年間，在銅鑼灣開設的日系百貨公司，現在香港的公車站牌也還延用「大丸」之站名。這篇文章的作者魏紹恩讀了台灣譯者賴明珠所譯的《風》和《彈珠》，對主角「僕」的好友「鼠」產生深刻共鳴之後，在日系百貨公司進了伯恩邦英譯本 *A Wild Sheep Chase* 時，被友人告知這個消息。

此外，在葉蕙的《羊》譯本出版兩個月前，評論家葉積奇在一次以村上為主題的座談會上指出：「村上的作品成功地反映出一些中產階級對現實的不滿，卻又對世間事有份無奈的感覺。……村上的作品令人產生一種感覺，在人的生命中，畢竟還有些東西可以信賴、可以捉摸得到。……（《羊》等作品）都與找尋某些東西有關。」¹⁶

14 葉蕙：〈村上春樹——一個永不褪色的記號〉。

15 魏紹恩：〈等待驚喜：周星馳／村上春樹〉，《電影雙周刊》（1991年3月21日），頁18-19。

16 葉積奇：〈村上春樹跟你做個 friend〉，《號外》第188期（1992年5月），頁123-126。

如前所述，在八〇年代的香港，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喜歡閱讀英美文學作品，不太留意中國文學及日本作家。而精通英語的文化人等不及華語譯本出版，結果和歐美讀者同時喜歡閱讀《羊》。香港人也懷著《羊》一書中對現實感到無力，卻仍對人生抱著希望的「中產階級感覺」，或許這也是歐美讀者對《羊》產生共鳴的原因之一。也許這就是九〇年代初期港人和歐美人士共通的「中產感覺」。

五、香港電影界的村上之子

提到主演《重慶森林》、《花樣年華》、《阿飛正傳》等電影的梁朝偉，可以說是香港第一位的英俊演員。他在訪談中談到村上春樹時，曾表示喜歡《森》一書。¹⁷

兩人一伙的女子歌星 Twins 之一的蔡卓妍也喜歡村上春樹的作品，讀了《森》兩遍的她說：「我是一個表達能力不高的人，講說話要用很多篇幅才能表達自己想講甚麼，所以我很喜歡村上春樹那種描寫事物的手法，覺得好似我。」¹⁸

此外，由村上作品改編的日本電影，也常在香港成為討論的話題。在《森》發表前由山川直人導演的《麵包店再襲擊》（1982）與《遇上 100% 的女孩》（1983），二十年後在香港特別上映：「令人很想看到小說化成電影後是怎麼的一回事，導演更專程來港出席討論會。」¹⁹ 首先即表明了港人的期待感。而上映之後，港人的記憶是：「山川直人拍成了短片，多年後在香港放映仍是很受歡迎。」²⁰ 2004 年由市川隼導演執導，尾形一生、宮澤理惠主演的改編電影《東尼瀧谷》，也在 2005 年 4 月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中上映，成為當時一大話題。

在台北，《東尼瀧谷》以宮澤理惠的人氣為後盾，在 2006 年 3 月長期放映。但是前面提到的山川直人的兩部電影，在台灣報刊雜誌並沒有報導。中國也是如此。對於村上文學改編的電影也顯示高度興趣的，就是香港。不僅如此，港人早在 1991 年就夢想以香港演員來演出村上的作品。

17 〈偶像逛書店〉，《星島日報》（2000 年 6 月 13 日）。

18 陳家昌：〈專訪蔡卓妍願做地上一粒塵〉，《香港經濟日報》（2004 年 8 月 9 日）。

19 〈文化特區〉，《明報》（2003 年 2 月 13 日）。

20 岑朗天：《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頁 47。